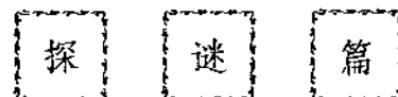


目 录



1 我焚烧了希特勒的尸体	[德]海因兹·林格
	王家宝 秦志明译 周以光校
23 德国“国会纵火案”的替罪羊昭雪	紫 翠
26 赫斯为什么出走?	王志佑 首 涅
35 隆美尔并非“重伤逝世”	宋钟璞
41 齐亚诺之死内幕	王延生
46 拿破仑之死	赵立兴
51 法国历史上的“铁面人”是谁?	修海涛
55 林肯遇刺前后	[美]利诺依·海曼
	刘欣译 刘隆平校
81 肯尼迪之死	肖 涅
87 三K党是怎么回事	郝贵远
92 扶桑之谜	宗 然
98 哥伦布疑案	霜 叶
101 “瓜亚基尔迷雾”和后人的推测	钱明德

寻

趣

篇

- | | |
|----------------------|-----|
| 105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 郁炎之 |
| 107 谁是发现达·芬奇的“伯乐”？ | 周东涛 |
| 110 关于犹大形象模特的传说 | 周广远 |
| 110 犹太人的历史圣地——“哭墙” | 郭文豹 |
| 113 西非古国趣话 | 宁 骥 |
| 117 什么叫“百科全书派”？ | 萧柏柯 |
| 119 拿破仑不愿“杀鸡取蛋” | 陈 章 |
| 121 无名小岛出了名 | 平 坦 |
| 122 “卡诺萨觐见” | 庄俊华 |
| 123 闯入美泉宫的年轻刺客 | 刘光耀 |
| 124 血淋淋的广告 | 心 |
| 125 理发店的三色柱标志 | 刘劲生 |
| 126 美国总统选举琐闻 | 柯 可 |
| 129 “厨房内阁”由来已久 | 朱洪魁 |
| 130 欧洲古币上的人物肖像 | 叶义生 |
| 131 戈林自杀的毒药藏在哪儿？ | 雅 士 |
| 132 巴士底狱的钥匙在哪里？ | 融 |
| 133 地中海原是沙漠 | 白 萍 |
| 134 大钟拾锦 | 桂 湘 |
| 136 古代世界之最 | 晓 华 |
| 137 日本女子和服为什么有个小“包袱” | 乐 佳 |
| | 韩 武 |

溯

源

篇

- | | |
|------------------------|-----|
| 140 圣诞节及其风俗的缘起和发展 | 董斯美 |
| 143 圣诞贺片和贺年片 | 李松林 |
| 144 “万愚节”追溯 | 马香雪 |
| 145 外国公侯伯子男爵位名称的由来 | 敬东 |
| 146 决斗 | 严武 |
| 152 基督教的起源和耶稣 | 司马英 |
| 158 凡人耶稣 | 胡玉堂 |
| 163 十字架象征意义的演变 | 高陶 |
| 165 法国的“热月”、“雾月”等属什么历法 | 李文厚 |
| 166 “第三帝国”一词源出何处? | 文洋 |
| 168 话说“𠂇”字 | 刘敬钦 |
| 169 以色列国是怎样建立的? | 李金河 |
| 175 “山姆大叔”的来历 | 曹广俊 |
| 176 “约翰牛”考 | 或为 |
| 177 “图腾”崇拜是怎么回事 | 邵念诚 |
| 180 撒哈拉沙漠原是大草原 | 王均林 |
| | 王瑞聚 |
| | 李南友 |

小

史

杂

谈

- | | |
|-------------------|-----|
| 184 世界人口普查小史 | 公须 |
| 185 英国历史上有几个女王 | 李松林 |
| 187 日本武士阶层的兴衰 | 卢春生 |
| 191 关于吉卜赛人种种 | 陈广嗣 |
| 194 娑三四郎生活在怎样的时代? | 石峰 |

199 照相小史	晓 阖
202 自行车小史	卢艳丽
204 扑克牌上的历史	傅聚文
205 火柴的来历	石 临
206 最早的自来水笔	魏 新
206 “小马快递”	孙真瑞
208 航空邮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志新
209 跳跃和旋转的文明——芭蕾小史	晓 梅
214 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禾 禾
221 源远流长话足球	李长林
224 球门、门网的演变	劳 任
225 深受欢迎的排球运动	吴会艺
227 西班牙斗牛沿革	劳 任
230 马上风云	何锐鹏
233 美国职业教育小史	张芬梅
238 布哈林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	齐 鸣
	苏绍智

探 谜 篇

我焚烧了希特勒的尸体

〔德〕海因兹·林格

王家宝 秦志明 译 周以光 校

关于希特勒之死，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曾是一个谜。1980年，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发表了一篇“我焚烧了希特勒的尸体”的文章，作者海因兹·林格曾是希特勒的卫队长，跟随希特勒达10年之久，目睹了希特勒在自杀前的种种情景；希特勒自杀后，他又亲手在尸体上浇了汽油，加以焚毁。本文是1980年林格去世前留下的一份手稿中的部分章节。

凄凉的祝寿典礼

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地下室举行的希特勒最后一次祝寿典礼，是我毕生所出席过的最凄凉的典礼。那是1945年4月20日，俄国人的炮声在我们周围震耳欲聋。10天之后，元首就在我面前自杀身亡。

往年，典礼从19日夜晚延续到20日，我先让元首参谋部人员在外恭候，深晚12时他们才进入总理府大厅向他祝寿。这次却大不一样。帝国的要员再也不能云集总理府。总理府已是一片废墟，布满弹坑的地上尽是大理石碎片、水晶吊灯

渣子、七零八落的家具。沉甸甸的大门早已倒塌。只有一间房子未遭破坏，成了司令部。

地下室距地面50英尺，有一阶梯通向总管办公室。就在地下室里，元首对我说：“我决不允许大家象往常那样向我祝寿。请转告诸位来宾，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向我祝贺的。”

将近午夜，总理府的7位要员在候见室恭候。这是和地下室旁的9间同样窄小的一个房间，对面是元首办公室、爱娃·勃劳恩的小客厅、会议室（由此可至安全门）。这些人中有：副官威廉·布格道夫将军、党卫军头子赫尔曼·菲格莱因（爱娃·勃劳恩的妹夫）和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尤利乌斯·夏勃。当我进去通报时，希特勒以一种厌倦、绝望的眼神盯了我一眼，要我告诉来访者，他没有时间接见。但是，格利特的丈夫利用与爱娃的亲戚关系来到她的房间，执拗地要求她去说服元首见一见特意来祝贺的人。爱娃成功了，希特勒勉强地站起身，弓着腰，步履蹒跚地来到候见室。来宾刚脱口说：“向您祝贺……”，希特勒扭过身就走了。后来又来了6个人，其中希特勒的私人飞机驾驶员汉斯·鲍尔好不容易和元首说上了话。

开了一次很短的军事会议。会后，爱娃·勃劳恩走进希特勒的办公室。他俩一起喝了茶，然后退到隔壁房间。迫于形势，祝寿活动草草收场。

次日上午不到9时，我不得不叫醒刚躺下的希特勒。布格道夫将军刚收到一份关于前线战况的重要报告。希特勒没顾上穿衣服，就出现在房门口了。

“什么事，布格道夫？”元首问道。

布格道夫告诉元首，俄国人突破了柏林郊区古本和福斯特之间的防线。

将军走后，希特勒对我说：“林格，我还没有睡好，比平时晚1小时，也就是下午2时叫醒我。”

下午2时，我叫醒希特勒，他吃过饭就让人牵来了沃尔夫——他心爱的母狗勃隆迪下的小狗。他和小狼狗一直玩到和爱娃、秘书们再进餐时为止。元首的心情愉快极了，除了爱娃和我外，他把所有的人都摒在门外。

然而，他还是躲不过他想躲避的祝寿典礼。将近下午3时，部分中央集团军军官、希特勒青年团代表、警卫队和党卫军成员簇拥在总理府地下室入口处。希特勒身穿陆军服，勉强地朝他们走去，我和海军副官冯·普特卡梅尾随在后。希特勒一出现，大家立即立正，默默地举起右臂，致以“德国式的敬礼”。以希姆莱、鲍曼为首的其它几位尚在柏林的官员则聚集在附近的花园里。下午4时，在地下室举行了关于前线战况的例会。希特勒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地下室。我挨个通报了戈林、里宾特洛甫、邓尼茨、凯特尔的到来。他们缄口不谈即将来临的灭顶之灾，只是表示祝贺，愿为元首尽忠。

希特勒病入膏肓

元首很有办法，他能迷惑前线回来看望他的军官、士兵甚至他身边的人，我对此一直惊讶不已。他能打动他们，给他们鼓气。将军们来时决定要如实汇报战况，离开时却象“喝了元首的迷魂汤”，异口同声地说：“元首向我解释了一切，事情都清楚了。”除个别人外，没有人觉察到火山已经完全熄灭。可就是这个希特勒将面对决定他命运的最后10天，这10天是从最末一次寿辰到他临死前和爱娃·勃劳恩举行婚礼，以及4月30日即红军先遣部队进入总理府前夜，他

俩同归于尽为止。

即使此时此刻，元首依然是使周围所有人黯然失色的伟人。虽然他知道这一点，但仍不免神经过敏，对谁都极端不信任。除了他的亲信邓尼茨、戈培尔、鲍曼和我们外，他不再接近任何人。他感到周围充满了危险和障碍。事实表明这种不信任并非凭空杜撰，因为甚至象希姆莱这样的人也违背元首的意志和“敌人”谈判。元首咬牙切齿，把精疲力竭的身子蜷缩在宽大的斗篷里，想继续扮演能呼风唤雨的元首角色。

我侍候元首将近10年，我了解他。他的身体极端虚弱，手臂下垂时，颤抖得厉害。因此，他总是设法把手臂靠在桌子上或椅背上。

1944年7月20日遇刺后，元首的健康日趋恶化。他虽然安然无恙，却从此烦恼不安。10月，一场心脏病更使他心力交瘁。新来的医生吉津格博士被叫到床边。希特勒面色苍白得象死人一样，很快就昏睡过去了。吉津格博士耽了片刻，离开前嘱咐我以后当元首发病时该如何对付，并答应我对此事守口如瓶。从此我比以往更注意保护元首，使他免受外界的扰乱。我小心翼翼不让任何人知道此事，即便是鲍曼或希姆莱也罢。如果元首的健康状况许可的话，那我也得告知吉津格博士，然而这毫无必要。

希特勒重又恢复了健康。从此，我和吉津格博士互相视为知己，关系更为密切了。我因此能从博士的嘴里知道他对元首病情的想法，希特勒和他一起议论的事情，病人在过去几个星期中吐露的隐情，因为医生来看病时我不总是在场。据我个人的观察，以及从我和吉津格关于希特勒病情的议论来看，自1934年以来，希特勒从来没有象1944年10月那样离死

亡更近。

心脏病后希特勒很快就恢复了体力。当我们见面时，他直言不讳地承认他曾病得很厉害。他一再询问“他不省人事时”的情景。

他承认：“只昏迷了一刹那，马上就好了，不值得担忧。”他相信我不会对任何人提起此事，因此没有关照我保守秘密。我不知道希姆莱这样的人一旦获悉元首身体如此糟糕，会发生什么情况。

勃兰特和哈泽尔巴赫医生从元首身边调走了。吉津格博士也在10月7日最后一次为元首看病。只有莫雷尔博士留了下来，而他的助手、党卫军成员路德维希·斯吐姆菲格博士是希姆莱推荐的。元首疑神疑鬼，只服我亲手递给他的药。

困兽犹斗

我从1935年起就在元首跟前服务了。当时，千百万德国人的愿望是和阿道夫·希特勒在一起，即使待一会儿也行。说得更确切些，“若要万事如意”就得和元首在一起。这一年，当我出乎意外地被看中担任这项职务时，大家无不羡慕，我也为之咋舌。老实说，我不值得让人如此“青睐”。我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曾在建筑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修完建筑职业学校的课程，为了当一名建筑师。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上台，同年3月我在诞生地不来梅加入了党卫军。我在柏林服役1年后，于1934年7—8月间和其它20多个同伴被部队派到上萨尔斯堡帝国总理的山间官邸担任警戒。报到那天，希特勒在他的山间居处伯格霍夫和我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了每人的情况。他问我从何处来，军龄多大。我们这些年轻的士兵都把希特勒视为偶像，因而这次

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柏林的帝国总理府需要两名侍卫官。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中我和另一名党卫军成员奥托·梅叶尔去侍候元首。1935年1月，我们在慕尼黑附近的帕森高级旅馆学校实习。希特勒的侍从、海军出身的卡尔·克劳斯告诉我们须知事项。希特勒的意思是：一人在他身边侍候，一人随他外出。元首还提醒说，他的衣柜和住所要始终保持整齐，有几个女仆可供我们使唤。希特勒的第三个侍从负责解决有关房屋维修等问题。

就这样，在享受了10年的荣誉之后，我依然和身陷险境的希特勒在一起。在我刚叙述的令人伤感的祝寿典礼后两天，即4月22日下午，希特勒在会上宣布他已决定留在柏林。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以前还一直盼望希特勒马上把司令部搬到所谓的阿尔卑斯堡垒里去，此时感到希望又破灭了。鲍曼尤其感到失望，因为他已经为搬迁作了准备。这个决定对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他脑子里早就在盘算如何在阿尔卑斯山里进行战争了。相反，戈培尔的意见却大相径庭。他梦想在柏林有个英勇壮烈的结局，他认为希特勒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举动。

很难解释希特勒作出如此决定的动机，可能和党卫军将军菲立克斯·施坦因纳违抗军令有关。希特勒4月21日曾命令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俄国人赶出首都，并答应派空军支援他。然而，由于几乎没有什飞机可供作战，而希特勒所允诺的部队又大部分只是纸上谈兵，施坦因纳认为只有把部队带到西线投降美国人才是上策。希特勒闻讯后怒不可遏。他暴跳如雷地咒骂施坦因纳不忠、扯谎、懦弱、渎职。并宣布今后不再给武装部队下达命令。其实，早

有迹象表明戈林在和“敌人”谈判，现在他也可以设法脱身了！

从此，除绝对必要的会见，希特勒一概不会客。我很为难，但又不得不遵命。

希特勒面有愠色地对我说：“瞧！林格，连党卫军都不例外，只要有可能，他们就退缩，就背叛我。至于我，我现在要留下和柏林共存亡。我已病入膏肓，手枪都使不好。我将要以身殉职，这是一个被围困在要塞里的指挥员应尽的职责。”

所有试图劝说希特勒离开柏林的努力都无济于事。然而到了4月26日，有几个乐观分子还幻想希特勒之所以留在柏林，是因为他毕竟还能转败为胜。他们竭力从微乎其微、甚至是昙花一现的吉兆中看到决定性变化的希望。如4月26日，在波希米亚作战的斐迪南·舒埃纳尔将军在向柏林挺进时，出乎意外地有了一些进展。同时，瓦尔特·温克的部队成功地突破了防线，靠拢波茨坦。因此，苏军在柏林的包围圈似乎受到了来自北边的威胁。

爱娃·勃劳恩的妹夫被处决

希特勒的自信感染了周围的人，但转瞬即逝。德军装甲车向后转了，不是开往柏林，而是向北溃退。我们先是欣喜若狂，转眼又萎靡不振起来。秘书们恳请“头头”分发毒药以便“应付紧急情况”。负责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的联络官、党卫军将军菲格莱因突然间无影无踪。希特勒早从路透社的电讯中得知希姆莱想和西方盟国单独媾和，他既忿恨又失望，他怀疑菲格莱因串通希姆莱背叛他。

“菲格莱因在什么地方？这个卑鄙的家伙到哪里去了？”

鲍曼大声喊叫。

司机肯普卡说，他按菲格莱因的命令把总理府最后两辆车交给他去执行任务。车回来了，人却没有回来。菲格莱因在库菲斯滕丹大街附近下了车，据他说是去执行谍报任务了。

与此同时，菲格莱因的副官回到了地下室，他招认，菲格莱因回到柏林住宅后脱下党卫军制服，换上了便衣。党卫军将军菲格莱因劝他也这样做，等待俄国人的到来，然后伺机和希姆莱会合。副官拒绝了。

对鲍曼、希特勒和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很清楚：菲格莱因是个只顾自己逃命的叛徒、懦夫。菲格莱因虽身为党卫军将军，并和爱娃·勃劳恩沾亲带故，他还是企图身穿便衣在动乱中溜之大吉。

4月27日，党卫军保安队在他和一个陌生年轻女子同居的住宅中找到了他，他没有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在一起。他弄到了10万马克和一些首饰、金子，准备好了箱子，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柏林。头天晚上，他打电话给爱娃·勃劳恩，劝她也尽快逃离首都，但遭到了拒绝。

当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兵把他押到地下室时，他显出愁眉苦脸的样子。他带着手套和运动帽，披着皮大衣，活象库菲斯滕丹大街上的纨绔子弟。按希特勒的命令迅速召集起来的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爱娃·勃劳恩显然进行了一番内心的斗争，尽管元首曾表示可以把这位全身佩满最高勋章的党卫军将军派到前线去作战，但她还是放弃了要求元首宽恕她丈夫的打算。将近子夜，菲格莱因被带到总理府的大院里，在行刑队面前面不改色地倾听宣读起诉书，然后象一名军人那样被处决了。

临死前的婚礼

行刑后不久，希特勒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
说：“林格，我想让你和家人团聚。”

当时，我做了一件从未敢做的事：我打断了希特勒的话，一口气地说出：“我的元首，在胜利的幸福时刻我和您在一起；在这困难的日子里，我也要和您在一起。”

希特勒温和地注视着我，说：“我对您仍然寄予希望。”
希特勒站在办公桌边继续说：“我还有一事相托，过去我总是命令被围的指挥官至死抵抗，今天我不收回成命。这项命令对我同样有效。眼下我就是柏林的指挥员。你去准备两条羊毛毯子，并把足够焚烧两具尸体的汽油放到我卧室里。我和爱娃·勃劳恩将在此自尽。你用羊毛毯裹起遗体，抬到上面花园里焚烧”。

这些话使我瞠目结舌，我结结巴巴地说：“是，遵命，
我的元首！”我再也说不下去了。

4月29—30日夜晚，柏林市政府参议员瓦格纳冒着轰炸
被叫到总理府主持婚礼。清晨，婚礼在地下室的地图室里举
行。我原先想象中的元首“婚礼”应是另一番景象，但事实
与想象相去很远。今天出席婚礼的来宾寥寥无几。瓦格纳穿
着人民冲锋队制服，该队是最后一批尚有作战能力的老战士
组成的民兵组织。当他出现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希特勒早
就命令把通常举行军事会议的房间布置成婚礼厅。在桌子边
为希特勒、爱娃·勃劳恩以及两位证婚人戈培尔和鲍曼准备
了4把椅子。后两人是希特勒的亲信，此时和其他“来宾”
一起在此恭候。

瓦格纳和爱娃·勃劳恩一样激动，手里拿着两页用打字

机打的表格，表内说明新婚夫妇是雅利安人，没有遗传病，愿意和对方结为夫妇。瓦格纳用颤抖的声音补充说：“值此签署这庄严的结婚证书之际，我当着诸位证人的面，请问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您是否愿意和爱娃·勃劳恩小姐结为夫妻。如愿意的话，请回答‘是’”。

希特勒回答“是”。瓦格纳接着问爱娃·勃劳恩：“请问爱娃·勃劳恩，您是否愿意嫁给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爱娃·勃劳恩也表示愿意。主婚人宣布婚姻有效，希特勒、爱娃·勃劳恩、戈培尔、鲍曼和瓦格纳依次在证书上签字，仪式宣告结束。

希特勒夫妇接受了大家的祝贺。1时半，新婚夫妇退席后，戈培尔夫妇、鲍曼、布格道夫、赫维尔、阿克斯曼、冯·贝罗、元首女秘书克里斯蒂尔、元首私人副官和我总共10人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席上有香槟酒，三明治和茶。气氛与当时的形势相称。

我被俘后，俄国人曾问我希特勒为什么在自杀前一天还要举行婚礼。俄国人认为这是判断希特勒的证据，提出这种判断的不仅是俄国人，即从任何观点来看，希特勒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分子，他认为凡事都要合乎规章制度，按官方格式，盖上徽章钢印才能有效。当然，希特勒本人并不重视这张结婚证书，他只是为了满足爱娃的愿望，因为她到柏林来就是希望作为元首名正言顺的妻子与他同归于尽。

可以认为，希特勒1945年4月29日的私人遗嘱解释了决定结婚的真正原因：“在战争的年代里，我不能负起组织家庭的责任，现决定在我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娶这位年轻姑娘为妻。她数年如一日忠于友谊，并自愿来到这个几乎被包围的城市与我同生共死。她将作为我的妻子和我一同死去。我

们认为，我为人民效劳使我们蒙受了损失，这一切将因死亡而告结束。”

爱娃·勃劳恩婚后的态度说明希特勒言之有理。她似乎对灭顶之灾视而不见，对凄凉境遇无动于衷。婚礼后，当我遇见她，有意称她为“希特勒夫人”，而不是用当时习惯的称呼：“尊敬的夫人”时，她幸福地笑了起来，两眼炯炯发光，并把她的手久久搭在我的手臂上不放。

爱娃·希特勒！这就是她10余年来梦寐以求的称呼。希特勒夫妇稍吃了点东西便去睡觉了。只留下我们这些“亲信”在地层深处庆祝婚礼。这时，俄国人正以密集的火力炮轰总理府附近的花园。

最后的告别

次日，4月30日，一大清早我就来到希特勒房间，我到时，他正打开门。他象前几夜那样是和衣入睡的。鲍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枪不离手，在他房前的沙发椅上打盹，秘书们则倒在候见室的床垫上，等着事件猝然到来（俄国人随时可能出现在地下室的入口处）。

希特勒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叫醒那些熟睡着或半睡着的同事们，要我跟着他走。我们来到电话间，他给前线司令挂了电话，后者告诉他防线已经崩溃，俄国人的包围殊难突破，依靠援军无望。尽管如此，阿图尔·阿克斯曼还是建议元首乘一辆装甲车，在200名希特勒青年团员保护下从柏林突围。但是希特勒拒绝了。

“这无济于事，我留在这儿。”希特勒低声说。

“说出真相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一起进餐，听希特勒一人滔滔不绝地展望未来。他说：“子孙后代将以最严厉的

态度来对待我。敌人将尽情享受胜利的欢乐；德国人民将经历极其艰难的岁月。同样，令人难以想象的命运即将降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但是，希特勒相信将来历史一定会给他以公正的评价。历史将会承认希特勒的所作所为纯粹是为了德国的利益……

饭后，爱娃·希特勒走过来向我诀别。她彻夜未眠，脸色惨白，强压住感情，感谢我“为元首尽到了责任。”最后，痛苦地对我说：“日后遇见我妹妹格利特时，不要对她说她的丈夫赫尔曼·菲格莱因是怎样死的。”

爱娃·希特勒向玛格达·戈培尔房间走去；希特勒则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古塞对我说，戈培尔夫人还希望和希特勒单独谈谈。我把话传给了希特勒，他表示同意接见。他们俩谈了很久。当我再进去时，希特勒正对她的忠诚和效劳表示感谢。按照希特勒的吩咐，我从元首的一件军服上取下了一枚金质党徽，他把它挂在戈培尔夫人的裙子上，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誉”。

希特勒和我回起居室，这时戈培尔博士跑来恳求元首立即离开柏林。希特勒回答得很干脆：

“博士，我的决心您是了解的，我将忠实执行。不过，您当然可以携带全家离开柏林。”戈培尔自豪地说他根本就没有这种想法，他要和元首一起在柏林以身殉国。希特勒和他握了一下手，由我扶着向他的卧室走去。

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向大家一一诀别，首先和他的私人飞机驾驶员汉斯·鲍尔以及奥托·古塞诀别，他们俩一向对元首赤胆忠心，矢志不渝。

我感到喉咙哽塞，因为我将要执行我的最后的任务。我恐惧地把视线转向我曾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那个人。他站在

那里，弯着腰，额上依然耷拉着一绺头发，然而头发已经变得灰白。他看见了我，用疲倦的眼神示意他即将离去。下午3时，我最后一次立正向他告别。元首极为轻松，如同要我去花园里找东西一样，以一种镇定的语调说：

“林格，我将要自尽，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我已命令其他人杀出地下室，你加入其中一组，向西突围。”

“我们为什么还要死里逃生呢？”我问道。元首说：“为了子孙后代。”

我砰的一声靠拢脚跟，做了个立正姿势。希特勒迟疑地往前走了两、三步，向我伸出手来，一生中最后一次行了个德国式的敬礼。此时此刻，我深深地被感动了。

我转身关上门，向地下室出口跑去，元首的卫队就在那里。因为我猜想希特勒随时都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没耽多久又回到了办公室对面的候见室。走近时，我闻到了一股火药味，看来一切都完了！尽管此事已确实无疑，但我还是在门口徘徊许久，不敢贸然进去。

我来到鲍曼的房间，有几个人正围着他，谈论什么我再也记不起来了。我招呼鲍曼，请他陪我去元首的办公室。到了门口，我推门而入。

鲍曼的脸一下变得煞白，用狂乱的目光看了我一眼。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坐在沙发上与世长辞了。希特勒用1支7.65口径的手枪往右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这支枪和另一支备用的6.35口径的手枪都落在他脚边。希特勒的脑袋稍稍偏向墙壁，鲜血流在沙发边的地毯上。他的夫人爱娃挨在他右边，双脚蜷缩在沙发上。肌肉抽缩的面孔说明她服了氯化钾。毒药的“痕迹”在她脸上显而易见。装氯化钾的匣子放在桌上。我把她的身子稍稍挪动了一下，以便执行我的“任务”。